

香江啟示錄

鄧亦瑛

自1997年7月1日開始，香港的割讓與租借結束，但香港所帶出來的啟示卻並未因此結束。第一是民主的啟示：香港與中國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，令人想到中國的獨裁專政是否有必要？沒有民主或是沒有獨裁，中國人便沒法體現自由？第二是世界都會的啟示。作為大都會，香港帶來的啟示是：如果不是「重農抑商」的傳統，在中國的大地上早就布滿了大城小鎮。新加坡與香港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，一獨立一回歸中國。中國人今後會如何看待這兩個大都會？是中國的「邊緣文化」或「邊區文化」？抑或是「中原文化」或「中心文化」？那就值得思考了。

一 導 言

自1842年被割讓出去開始，香港已給各方帶出了不少啟示。對英國來說，最大的啟示是中國的門戶不是不可以打開的，在中國的領土上建立一個殖民地政權不是做不到的。對其他列強來說，最大的啟示是中國這個文明大帝國竟然可輕易被打敗，而且被要求割地求和，可見已是體弱多病；其次是以香港政治與經濟案例，可以向中國強索或租借領土，以便在中國建立起自己的勢力範圍，謀取經貿的利益。對中國來說，啟示更大更多，單是王亞南便因此被啟發而想到中國官僚制度的流弊，認為要不是鴉片戰爭叫中國喪失領土，中國人還未警覺到，原來這個國家的官僚制度已陳腐到抵擋不了東來的西方勢力。另一個啟示是帶出了革命派的思潮，認為這個清朝政權已在香港割讓問題上被證明出無可救藥，中國人要自救便必須起來革命，不但要革清朝的命，亦要革文化的命，像西方一樣搞文藝復興、搞工業革命、搞法國大革命，如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便因此應運而生。但對改革派的啟示又不同，他們認為中國還不致敗落到此種田地，中國文化仍有優勢，要改革的只是把封建政權略加改造，像英國那樣，照樣可以君主立憲強大起來。梁啟超便是其代表。

總之，香港的割讓只是麻煩的開始，啟示也不斷湧出，在此數說不盡。

自1997年7月1日開始，香港的割讓與租借結束，但香港所帶出來的啟示卻並未因此結束，可能還更加泉湧。以下便是將其所已引起的啟示記錄下來，供各方深入探討。

二 啟示錄

第一：民主的啟示

當英國首先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後，接着世界列強競相對中國用武，令到中國一敗塗地，國人紛紛議論，結論是中國需要「民主」才能振興。

可是清朝的封建皇朝被推翻後，國民黨用「三民主義」為其憲制綱領，經歷了二三十年的戰亂與擾攘，終被共產黨用武力推翻，認為國民黨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，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民主，對於無產階級，便沒有民主可言。共產黨要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，只給無產階級民主，對資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，完全剝奪他們的自由。在共產黨獨裁專政的統治下，幾乎過了半個世紀，中國人也經歷了50年的不斷「革命」，不但找不到民主，也不認同有甚麼宇宙性的民主，更找不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。總之，中國在50年共產黨統治下，仍然在尋求民主的答案。甚麼時候有答案？連掌握中國政權的共產黨也說不上，尤其是歐洲共產政權全面崩毀後，依賴馬克思主義提供民主答案的希望也就更渺茫，如果不是絕望的話。

值得留意，而舉世也留意到的，是香港在割讓給英國後，一直在英國的統治下，循着自由主義 (Liberalism) 的憲政行事，即使是殖民地卻不用高壓的政治



手法統治，反而是循用「自由主義」的一套原則：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佳的政府。這一套統治辦法，也正是百多年來中國政府領導人最不敢相信，也不許人民去相信的一套，這一套不但不會把香港搞垮，反而是中國人居住的最富有、最繁榮、最有建樹、最自由的地方。這百多年來，中國大陸一直怕政府如果管得不夠緊、不夠專政，中國便會大亂——經濟亂、社會亂，亂到無可收拾，亂到國破家亡。但愈是專政的結果，中國愈是貧窮落後，既失去自由，又失去繁榮，變成是中國人居住的最不自由的地方，連共產黨自己也承認是個「獨裁專政」的國家。

因此，香港與中國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，因此也就帶給中外不少啟示。令人想到中國的獨裁專政是否有必要？中國人是否沒法在「自由主義」下生存，或是恰好相反？中國是否沒法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找到一個共同繁榮的空間？抑或是一定沒法共存？沒有民主或是沒有獨裁，中國人便沒法體現自由？中國人太自由了是否就無法安定與自律？所有這些問題，都因香港這百年來的存在與發展而被引發出來，如果沒有香港的現實，這一切問題都變成不現實，亦沒法使討論變得現實，更沒法使討論得到現實的答案！

第二，世界都會的啟示

中國自秦統一開始，便有「重農抑商」的國策。據《史記》所載，秦滅六國之後，把當時興起的大城市都加以摧毀，把城市人口安插到全國各地農村，從此以農立國的勢便形成。漢承秦制，據出土文物揭露，有嚴厲壓制城市化的傾向，中國經過「外戚」擁權大搞商業化，但終被當作亂事平定。據《鹽鐵論》所揭示，重農或重商誰對誰非，曾在桑弘羊為相時在朝廷上展開大辯論。反對抑商的「文學」一派，攻擊「官與民爭利」與「農為軍用」的政策，論說「藏富於國」會使「國用兵於外」、「民窮於內」，進而指出這是漢武帝連年征戰、民不聊生、國運中落的根本原因。因此主張：「官不與民爭利」，民便富有，便會出現「藏利於民」，國庫不充實便不會東征西討，農為商用，自然會作出種種調節，國與民的互相協調也不例外。

可是漢亡之後，歷代仍然體會不到《鹽鐵論》裏頭的智慧，循着「重農抑商」的傳統走，尤其是每當新的朝代起來後，總要把前朝末代興起的城市加以壓制，把城市人口重新向農村轉移。唐宋兩代出現的這種傾向尤其劇烈。唐代的農民「起義」是個經典例子；宋被元滅後，前者建立起來的工商業「奇迹」（李約瑟曾驚嘆宋朝的紡織工業，認為遠超過帶動英國工業革命的紡織業）也隨即變作「趙氏孤兒」。下經明、清兩代，都有述說不盡的「抑商」傳統，清朝更立下「斬頭」法嚴禁出海，動機雖帶政治性，但這也是鄙視或不重視商業的心態表現。正是為這種「海禁」法律，使到西商東來大大犯了當權者的忌惡，把西商與華商迫向「走私犯法」的途徑。在當權者百般嚴禁下，雙方的矛盾愈陷愈深，最後觸發戰爭。清軍屢戰屢敗，西人挾着「重商主義」的要求，迫使清廷准予在沿海建立商港，在短短不過百年間，廣州、廈門、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大連、青島、漢口、重慶這些商業大港好像衝出了歷史的牢門，在中國大地怒吼。

但是1949年毛澤東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軍又再一度擎起「重農抑商」的傳統大蠹，在中國大地來個空前未見的規模，全面清洗資產階級，把所有城市的大小商業封禁了差不多四十年。像上海那樣在本世紀初就已是世界的大都會，竟然在一夜間變成自由市場的死城，所有的店鋪全都禁止私營。

在這演不完的「重農抑商」革命史中，在不斷清洗商業城市的傳統中，香港竟然在劫運之外。1949年與1967年兩度面臨毛澤東的解放軍入城，但奇迹似地逃過大難，使到香港能繼續成長，成為今天的著名世界大都會。

作為大都會，香港帶來的啟示是：如果不是「重農抑商」的傳統，在中國的大地上早就布滿了大城小鎮。在近代文明建樹中，大都會的貢獻很大。上海這個大都會卻因受到壓制而無法參與這個建樹的行列中，如果不是抑商的傳統，中國會出現更多的大都會，誠如李約瑟所感嘆的，恐怕「工業革命」早就由中國領導了。

英國曾在世界文明建樹中創下不少貢獻，也有多類的貢獻，其中對大都會的建樹尤其顯著。其中倫敦、紐約、新加坡、香港，今天都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、商業中心、交通運輸重點，是帶動工業運作的火車頭，也是各類專業服務的中心。從新加坡與香港所帶來的啟示是：英國把倫敦與紐約交給了他們自己族人，而新加坡與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，一獨立一回歸中國。中國人今後會如何看待這兩個大都會？是中國的「邊緣文化」或「邊區文化」？抑或是「中原文化」或「中心文化」？那就值得思考了！

三 感 言

在九七回歸的中英糾紛中，有不少中國人把英國及英國人當成沒落帝國與沒落的民族。持這種看法的人是不會看到英國及英國人對世界科學文明的貢獻。不錯，就國力來看，英帝國已經沒落；但就民族來看，英國人與英國文明思想已化成遍布世界角落的進步力量。文明與語文分不開，英文成為世界語言未曾沒落，也未見到沒落的趨勢。因為世界文明已由英文去表達與發揚。文明與教育分不開，現代的教育有多個起源點，英國在這一點上影響世界最廣也最深遠，尤其是大學教育到學術研究更是方興未艾。文明與科學發明分不開，至今世界重大發明中的電腦、噴射發動機都是他們的傑作。如果把美國視作英人族屬的國家，那英美的科學發明加在一道更是功可蓋世。文明與商業也分不開，經濟理論的泰斗亞當斯密、凱恩斯，都是英國人。商業法、金融銀行都是英國人貢獻至鉅。

香港所帶來的啟示是：在民主與大都會兩個問題上，英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用實踐來證明，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也做得到。誠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看到的，如果中國人不輕視類似英國人及英國所創造的文明的話，中國人的科技史與中國人的智慧與創造，早就該帶領世界走向文明。香港的回歸會否成為中國傳統的夢魘，抑或是中國現代化的“Morning Call”，則要看中國如何對待香港了！